

“不斷革命”論

列夫·托洛茨基著

(供內部參考)



“不 断 革 命” 论

列夫·托洛茨基著



Leon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本书各部分译文所据原文，见正文内题注

“不断革命”论

列夫·托洛茨基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2月第1版

1972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3002·136 每册 0.66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者說明

本书包括托洛茨基有关“不断革命”論的两部主要著作：一是托洛茨基自詡为早期“論述不断革命論的基本著作”《总结与展望》（一九〇六年）；一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九年被驅逐到土耳其后写成的《不断革命》。为了便于研究、批判，托洛茨基所著《俄国革命史》的附录：《关于“不断革命”論的一些历史材料》，也一并译出附后。

“不断革命”論是托洛茨基的主要理論。这个“理論”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的修正和否定。它在俄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問題上表現不一，时而表現为冒险主义，时而表現为投降主义。尽管它經常披着“极左”的外衣，妄图欺世惑众，但仍无法掩盖其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本质。

早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討論党綱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問題时，托洛茨基就一再強調，当工人阶级尚未成为民族的多数、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尚未合成一体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民主主义专政的领导权，无可爭議地属于资产阶级。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暴露了他同列宁之間的分歧，并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定下了基調。

一九〇五年托洛茨基正式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論。在这以后，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两者間的相互关系問題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能否在一國內首先取得胜利等一系列問題上，同列宁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間的分歧

和由此产生的論战，直到列寧逝世，一直沒有間斷。

列寧逝世以後，托洛茨基在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被壓迫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策略上，又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人和國際共產黨人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在這場論戰中，托洛茨基重新搬出了他的“不斷革命”論，從各方面攻擊所謂“一國社會主義論”，實際上是攻擊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和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首先勝利的理論。這場論戰的最後結果是托洛茨基在理論上和政治上被徹底粉碎了。儘管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在理論上被駁得體無完膚，在革命實踐中碰得頭破血流，可是他二十多年來一直死抱住它不放。《不斷革命》一書，就是托洛茨基以論戰的形式為他的這個不斷破綻的“理論”塗脂抹粉、百般辯解的代表作。

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他的“不斷革命”論是由“互相聯繫的三個思想”構成的，這就是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和國際革命的“不斷性”。實際上，有些思想，例如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問題，托洛茨基過去並沒有明確論述過，在《不斷革命》一書中也只是提了一下，並沒有作系統的充分的闡述。

關於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無產階級為推翻沙皇專制制度而進行的第一次革命鬥爭中，曾經對這次革命的性質、動力和任務做出了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的論斷。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在這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必須掌握領導權，把農民作為可靠的同盟軍，實現黨的最低綱領，從而使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列寧把民主革命比作第一步，把社會主義革命比作第二步，主張尽快地走完第一步，然後向第二步過渡。“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列寧全集》第9卷，第221—222頁）這就是列寧加以發展的馬克思在十九世紀

四十年代提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

但是托洛茨基却从“左”的方面来修正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論。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資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并且解释說，对于資产阶级发展較迟的国家，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說来，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而“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着要深刻地侵犯資产阶级所有權的各项任务”。这样，“民主革命立即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所宣揚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革命发展的不断性”。列寧曾明确地指出，“托洛茨基的根本錯誤，就在于他忽視革命（指民主革命。——引者注）的資产阶级性质，对于这种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沒有明确的看法。”（《列寧全集》第15卷，第344頁）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問題，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以后，“必須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于是它“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而“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們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愈明确、愈坚定，它的立足基础也就愈狭窄、愈不稳”。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主动把革命推行到其他国家去，从而激起反对世界資本主义的革命战争。按照托洛茨基的邏輯，“社会主义建設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說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斯大林批駁托洛茨基的这种謬論，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有共同的利益，只要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

策，就完全能够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

关于国际革命的“不断性”問題，托洛茨基断言，社会主义是在一国“开始”的，但不能在一国“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維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无产阶级国家只要是处在孤立的地位，最后必然会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国的革命并不是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鏈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他硬說，世界性分工、苏联工业对于外国技术的依賴，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于亚洲原料的依賴等等，这一切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建設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事，而企图在民族范围内实现經濟的所有部門的完全平衡，就是寻求反动的空想。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是絕對不可能的，它在一国的舞台上开始，应当立即扩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然后迅速地发展到世界的舞台。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說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的錯誤在于抹煞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規律的重大意义，否认在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內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因而它不是發揮而是限制那些有可能单独突破资本主义战綫的个别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它不是推动个别国家无产阶级积极进攻，而是要他們消极等待“总爆发”的时刻；它不是在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間培养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精神，而是制造耽心“万一別人不来援助”的犹豫心理。它的錯誤在于不相信一国无产阶级有条件并且有能力在一

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設，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西欧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上面，因而在世界革命延缓到来的情况下，或者滚到“革命的”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立场上，或者滚到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立场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实质上是一种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詞句伪装起来的取消主义。

托洛茨基还在书中多处侈談中国的革命問題，吹嘘他的“不断革命”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他看来，“在中国，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已經沒有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已經同资产阶级剥削化學地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土地問題所占的比重”是无足輕重的，无需經過民主革命的阶段。这就是說，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要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他还別有用心地歪曲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借此攻击斯大林。并且胡說，“落后的中国”沒有可能“在自己民族界限以內建設社会主义，因为已經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一國內建設社会主义的”。

托洛茨基的这些荒謬的論点早已被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論断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駁倒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問題都做出了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早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談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問題时就曾經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6頁）毛泽东同志还写道。“我們是革命轉变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我們主张經過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們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頁）“中国現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沒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談

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頁，678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也明白不过地指出：“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我們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长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會議文件》，第15—16頁）

书中各篇据以譯出的原文版本均于各篇标题下面注明，原著頁次附印在譯文頁邊空白的地方，以便讀者需要时查考。

目 次

总结与展望	1
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重印本序言	1
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	8
第二章 城市和資本	15
第三章 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九〇五	21
第四章 革命和无产阶级	30
第五章 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35
第六章 无产阶级政治制度	39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45
第八章 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	61
第九章 欧洲和革命	66
第十章 为政权而斗争	73
不断革命	80
初版序言(俄文版,在柏林出版)	80
德文版序言	97
第一章 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	111
第二章 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进行一次“跳跃”， 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改造	131
第三章 “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	141
第四章 不断革命論在实践中是怎样的?	157
第五章 “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嗎?如果实现了， 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	175

第六章	論跳过历史阶段.....	189
第七章	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	193
第八章	从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	209
第九章	結束語.....	218
第十章	什么是不断革命?	222
关于“不断革命”的一些历史材料		227

總結与展望^①

161

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 出版的重印本序言

俄国革命的性质問題是使俄国革命运动的各种思潮和政治团体形成派别的根本問題。甚至在社会民主运动内，自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問題具有現實意义的时候起，就因这一問題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从一九〇四年起，由于这些分歧而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別：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孟什維克的观点是：我們的革命将是資產階級性质，也就是說革命的自然結果将是政权轉归資产阶级并为資产阶级議会制度創造条件。布尔什維克的观点則是：承认就要到来的革命必然是資产阶级性质，但是同时提出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一点作为革命的任务。

孟什維克的社会分析是极端肤浅的，这种分析实质上只是粗俗的历史类比，这就是那些“有教养”的市儈們的典型方法。不論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两极造成极大矛盾从而使資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降至无足輕重的事实，或者是后来实际形势的教訓，都沒有能使孟什維克停止对“真正”、“現實”的民主派的不倦寻求，他們认为

① 本书序言譯自英文版《不断革命和总结与展望》一书，正文据圣彼得堡一九〇六年出版的《我們的革命》(«Наша революция»,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 Глаголева. С.-Петербург)一书譯出。正文的第十章是托洛茨基后来补写的，在《我們的革命》中未收入，現在据苏联国家出版社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一九〇五年》第287—293頁所載原文譯出。——中譯者注

这种民主派将会领导“民族”并創造議会制的、尽可能民主的資本主义发展条件。孟什維克总是竭力到处去寻找資产阶级民主派发展的迹象，在找不到的时候就加以臆造。他們夸大一切“民主”宣言和表現的重要性，同时輕視无产阶级的力量及其斗争的前景。为了使俄国革命取得所謂历史規律所規定的“正当的”資产阶级性質，他們是如此狂热地拚命寻找这种主要的資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期間，当找不到主要的資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孟什維克便自己来执行这种力量的任务，并且多少有些成就。

絲毫沒有社会主义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阶级鍛炼的小資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革命形势下的行动当然不可能同二月革命中扮演“主要”政党的孟什維克有什么两样。資产阶级民主派缺乏真实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也表現在孟什維克身上，因为他們很快就夭折了，在革命进行了八个月之后便被阶级斗争抛在一边了。

与此相反，布尔什維主义决不相信俄国革命資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权和力量。它从一开始就認識到工人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是說到革命綱領本身，布尔什維克在最初把它限于千百万农民的利益，因为如果沒有农民的支持或者和农民对立，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們（暫時）承认革命的資产阶级民主性质。

至于对革命内部力量和革命前景的估計，作者在那时期沒有附和俄国劳工运动中的主要派別中任何一方的意見。他那时所支持的立場可以概述如下：以資产阶级革命作为其首要任务的革命开始以后，会很快引起强大的阶级冲突，并且只有当政权轉到唯一能領導被压迫群众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才能赢得最后胜利。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它不仅不願而且也决不能把自己限于資产阶级的民主綱領。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那时候，資产阶级民

主綱領連同它的國家界限將被拋棄，俄國工人階級的暫時的政治統治也將發展成為持久的社會主義專政。但是如果歐洲依舊停滯不前，資產階級反革命將不會容忍俄國勞苦大眾的政府，並將迫使這個國家倒退，倒退到遠遠不及一個民主的工農共和國的地步。因此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就不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的限度內。它必須採取不斷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須打破社會民主黨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界限，向愈來愈激進的社會改革過渡，並從西歐革命尋求直接及時的支持。這種觀點在現在重新發表的這篇文章原寫於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年間的文章中要加以發展和論證。

但是十五年來作者在堅持不斷革命觀點的同時，在估計社會民主運動中敵對的派別的時候陷入了錯誤。由於雙方的出發點都是資產階級革命，作者會認為它們之間的分歧不致深刻到引起分裂的程度。同時，他希望形勢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會清楚地證明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軟弱和微不足道，另一方面還會證明無產階級客觀上不可能受民主主義綱領的限制。他認為這一點足以根本消除派別分歧。

作者在侨居国外期間一直处在两派之外，他沒有充分認識到当时非常重要的情况：实际上，沿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間分歧的战綫，許多頑強的革命者正集中到战綫的一邊，而愈來愈陷入机会主义和調和泥坑的分子則集中到战綫的另一邊。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組織，團結了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識分子中一切最优秀的分子；布尔什维克（經過一些內部斗争）明白采取了旨在达到工人階級社会主义專政的策略，这完全符合俄国的整个国际形势和阶级关系。而孟什维克派那时的成熟程度仅仅足以担负我前面說过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

現在在向公众发行这书重印本的时候，作者不仅希望解释一

下促使他以及其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同志有可能在一九一七年初同这个党共命运的理論原則（这样一个个人的理由并不能成为重印此书的充足理由），同时也希望追述一下对俄国革命动力的社会历史分析；从这个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可能而且必須成为俄国革命的任务，远在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既成事实之前就是如此。我們現在有可能毫无更改地重印这本写于一九〇六年而其基本路綫在一九〇四年已經形成的小册子这一事实就充分证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在替代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孟什維克方面，而是在实际执行工人阶级专政路綫的政党方面。

一种理論的最后考驗是实际經驗。我們現在所参加的事件，以及我們参加的方式早在大約十五年前就在我們的基本路綫中預見到这一事实，就是我們正确地运用了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无可辯駁的证据。

我們重印了发表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七日巴黎《我們的言論報》上的一篇題为《为政权而斗争》的文章作为附录。这篇文章具有一个論战的目的，是对孟什維克領袖們写給“在俄国的同志們”
165 的綱領性“信件”提出的批評。在文章里我們得出結論：一九〇五年以后十年中的阶级关系的发展已經进一步摧毁了孟什維克对資产阶级民主派所怀的希望，因此很显然，俄国革命的命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地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問題联系在一起了……在所有这些年来思想斗争面前，如果有人說十月革命是“冒险主义”，那他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白癡！

談到孟什維克对革命的态度，不能不提一下考茨基的墮落成为孟什維克，他現在从馬尔托夫、唐恩和策烈铁里的“理論”中找到了他自己的理論和政治墮落的詞句。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我們曾听见考茨基說，虽然應該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俄国共产党并没有通过考茨基为它規定

的具体途徑和具体时间表取得政权，所以苏维埃共和国应该交给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和契尔諾夫去纠正错误。对于考茨基的反动陈腐的批评，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并读过考茨基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間所写的文章的同志們一定更感到意外。在那时候，考茨基（他确实不是沒有从罗莎·卢森堡得到有益的教训）充分理解到并承认：由于国内阶级斗争所达到的水平和资本主义的整个形势，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告终，而必不可免地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那时坦白地写过关于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工人政府的文章。他甚至沒有想到根据政治民主派的不断变化和外表上的結合情况来决定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的問題。

在那时候，考茨基懂得，革命将会第一次开始唤醒千百万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下子唤醒，而是逐渐逐渐地，一阶层一阶层地唤醒，因此当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广大的农民群众仍处于很幼稚的政治发展水平而会把选票投给仅仅反映农民阶级的落后和成見的中间政党。那时考茨基懂得，由夺取政权的革命邏輯所引导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任意无限期地延迟夺取政权行动，因为自己否定这项行动只会为反革命清扫地盘。考茨基那时懂得，无产阶级一旦夺得革命政权，它不会把革命的命运寄托在任何特定时刻最沒有觉悟、尚未觉醒的群众的偶然心情上，而是正相反，无产阶级会把政治权力集中在从事启发和组织这些落后和无知的农民群众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手中。考茨基懂得，如果把俄国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限制它的任务，那就意味着不了解世界上进行的任何事情。他和俄国和波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正确地承认，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欧洲无产阶级之前夺取了政权，它必定会利用作为统治阶级的形势给予欧洲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强有力的帮助，而不是把它的地位

迅速让給資產階級。所有这些充滿馬克思主義原則精神的世界範圍的前景，都要看农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所謂制宪議会选举中怎样投票和投誰的票而定，这一点并不是由于考茨基或是由于我們的緣故。

現在当十五年前概述的展望变成了現實的时候，考茨基却拒絕給予俄国革命以出生证，原因是它的出生沒有及时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治办公室里登过記。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这是对馬克思主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糟塌！人們可以完全正当地說，从第二国际最伟大的理論家之一对俄国革命所下的这个市儈的判断（一个比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贊成軍事撥款的投票更丑恶的表現）已經可以看到第二国际的墮落了。

167 几十年来考茨基发展并坚持了社会革命的概念。現在革命变成了現實，考茨基却在革命面前惊慌地退却了。他被俄国的苏維埃政权吓坏了，并且对德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强大运动采取敌視态度。考茨基很像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师的一生，他多少年来一直在他的气悶的教室里向学生們重复春天的描述，可是最后当他結束他的教員生活，来到新鮮空气里的时候，他却不認識春天；因而大为生气（如果这个小学教員可能生气的話），并且力图证明春天并不是春天而只是自然的大混乱，因为它的发生违反了自然历史的規律。幸运的是，工人們并不信賴这位甚至是最权威的腐儒，他們信賴的是春天的声音！

我們馬克思的信徒和德国工人們一齐坚持我們的信念：革命的春天已經充分按照社会自然的規律同时也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規律到来了，因为馬克思主义并不是小学教师的脱离历史的教鞭，而是对实际正在进行的历史发展的方式方法所作的社会分析。

我对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〇六年写的，另一篇是一九一五年写的）的原文都沒有作任何更改。原来我打算为原文加注，使它适